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ON REVOLUTION

论革命

Hannah Arendt

[美国] 汉娜·阿伦特 著 陈周旺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论革命

[美国] 汉娜·阿伦特 著 陈周旺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革命 / (美) 阿伦特 (Arendt, H.) 著; 陈周旺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2
(人文与社会译丛 / 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On Revolution
ISBN 978-7-5447-1575-1

I. ①论… II. ①阿… ②陈… III. ①美国独立战争(1775
~1783)-对比研究-法国大革命(1789~1794) IV. ①K712.41
②K56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0422 号

On Revolution by Hannah Arendt
Copyright © 1963, 1965 by Hannah Arendt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Penguin, a member of Pen-
guin Group (USA)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5-147号

书 名 论革命
作 者 [美国] 汉娜·阿伦特
译 者 陈周旺
责任编辑 黄颖
原文出版 Penguin Book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225 千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575-1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才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目 录

导言 战争与革命	001
一 革命的意义	010
二 社会问题	047
三 追求幸福	099
四 立国(一):构建自由	124
五 立国(二):新秩序的时代	165
六 革命的传统及其失落的珍宝	201
索引	265
译后记	280

导 言

战争与革命

迄今为止，战争与革命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十九世纪的意识形态，诸如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仍然被许多人拿来为自己正名，却与当前世界的重大现实丧失了联系。与之截然不同的是，战争与革命依然是当前世界两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它们要比自己的一切意识形态辩解更具生命力。革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仆后继，“在强国林立的地球上，承担自然法和自然神赋予他们的独立而平等的地位”。但战争所造成的大灭绝，威胁着以革命来解放全人类的希望。革命只剩下一个最为古老的理由，那就是“以自由对付暴政”。实际上，从我们的历史一开始，它就决定了政治的存在。

这本身就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现代“科学”，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以揭露真相为己任，在它们的合力围攻之下，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比起自由的概念看起来更应该安然入土的了。原以为革命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心安理得，甚至死心塌地将自己维系在这样一个传统之上：若是缺少了自由观念，这个传统几乎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有什么意义。孰料竟连他们也宁愿把自由贬为中下层人的偏见，不愿承认

11 革命的目的过去是而且一向就是自由。如果说，自由一词从革命的语汇中消失是那样不可思议；那么，近年来自由的观念卷入当下最严峻的政治争论的暴风眼中，卷入对战争和暴力合理之运用的讨论中，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从历史上看，战争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现象，而革命，确切说来，在现代以前并不存在，只有在最近的重要政治资料中，方可找到它们。与革命相比，战争的目的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与自由有关。诚然，类似战争的、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起义，常常会令人感到无比神圣，但是，它们从来也没有被人当成是唯一的正义战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为战争正名，即便是在理论上，也算由来已久，不过它当然不比有组织战争的历史悠久。显然，其中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信政治关系在正常进程中不会沦落到任由暴力摆布的境地。我们在古希腊第一次发现了这种信念。希腊城邦polis，即城邦国家，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界定为一种单纯依靠劝说而不依靠暴力的生活方式（这绝非自欺欺人的空话，不说别的，就拿“劝说”那些被判死刑的人服毒酒自尽这个雅典习俗来说，足见雅典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免遭肉刑的羞辱）。不过，由于古希腊政治生活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城邦的城墙之外，故对他们而言，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外交事务或国际关系的领域中使用暴力，乃是天公地道，不言而喻。他们的外交事务，也只不过涉及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希波战争，看到全希腊都团结起来。在城邦的城墙之外，也就是说，在希腊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之外，“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修昔底德）。

12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求助于古罗马，以寻找历史上为战争的第一次正名，寻找第一个认为存在正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的观念。可是罗马人的区分与正名，都跟自由无关，对侵略性和自卫性的战争也不加任何区别。“必然之战皆正义，”李维说，“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自李维时代起，千百年来，必然性所意味的

诸多事情,时至今日,用来给一场战争扣上非正义的帽子,要比冠以正义的帽子更加绰绰有余。征服、扩张、维护既得利益,鉴于咄咄逼人的新权力崛起而拼命维持自己的权力,抑或是支持既有的权力均衡——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权力政治现实,不仅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实际原因,还被认为是“必然性”,也就是说,被认为是诉诸武力解决的正当动机。侵略是一种罪行,只要是抵御或防范侵略,战争就是有理的,这种观点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现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所具有的可怕杀伤力一览无余之后,才获得了实践的乃至是理论的意义。

在传统上,为战争正名显然不以自由为论据,而是把战争当作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今天无论何时一旦听说自由被引入了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都会感到极其不快。“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高谈阔论,面对核大战超乎想象的空前杀伤力,不仅沦为一种空谈,简直就是荒诞不经。其实,为了自己国家和后代的自由而甘冒生命危险,与基于同样目的而牺牲全人类,两者之间是那样判若云泥,这就难免让人对“宁死也不赤化”或“宁死也不做奴隶”这些骗人口号的卫道士们大起疑心。当然,这并不是说,倒过来“宁可赤化也不愿死”就有多少可取之处。当一条旧真理已经过时,靠头足倒置并不能变得更真实。事实上,今天对战争问题的讨论,还处在这些术语的支配之下,从这一点就不难察觉,双方都是各怀心事的。号称“宁死也不赤化”者实际上在想:损失不会像有些人料想的那样严重,我们的文明会幸免于难;号称“宁可赤化也不愿死”者实际上在想:奴役并没有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他的天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换言之,此乃诤世欺人之谈,因为双方都在回避自己提出的荒唐取舍;他们并没有当真。^①

重要的是记住,自由观念被引入有关战争问题的争论,乃是在以下这一点昭然若揭之后:我们的技术进步已经达到了无法对杀伤手段加

^① 据我所知,敢于直面核武器的恐怖和极权主义的威胁,而毫无顾忌地讨论战争问题的,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人类的未来》(Chicago, 1961)。

以理性运用的阶段。换言之，在这场争论中，自由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deus ex machina*（“解围之神”），证明那些以理性为基础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可理喻。难道我们无法将当前令人绝望的纷争硬说成是黎明前的黑暗，称国际关系将会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也就是说，甚至不需要国际关系彻底变革，不需要人的心灵和思想发生内在变化，战争就将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会不会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表明我们对战争的消失毫无准备，表明我们要是不提起这一作为最后手段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就没有能力根据外交政策来进行思考了？

除了大灭绝的威胁之外——可以假设，通过新技术的发明，如一种“无放射性”炸弹或一种反导导弹来消除这种威胁——还有一些迹象指向这个方向。第一个事实便是，全面战争的种子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萌芽，那时，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区分再也得不到尊重了，因为它与那时使用的新式武器相冲突。诚然，这一区分本身是较为现代的成就，它的实际废除，只不过意味着战争又倒退到罗马人将迦太基人从地球上永远消灭掉的时代。然而，在现代条件下，全面战争的出现或重现，具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违背了一个基本假设：保卫平民百姓是军队的功能。政府的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一假设之上。相形之下，本世纪的战争史简直就像是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军队越来越不能履行这一基本功能，发展到今天，威慑战略公然改变了军队的角色，使它从保卫者变成了一个滞后的、本质上没有作用的报复者。

国家和军队的关系就这样扭曲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事实虽不怎么惹眼，却颇值得重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就由产生一种希冀，希望任何政府、任何国家或任何政府形式都不会强大到可以从战败中幸免于难。这一发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普法战争之后第二帝国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取代；1905年的俄国革命则是随日俄战争的失败而来，这场革命无疑是政府潜在危机的不祥之兆，专等军队失利

而爆发。无论如何,政府的革命性变革,不管是由人民自己造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还是由得胜方凭借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的要求从外部强加的,今天都不外乎是战败最有可能遭致的后果之一——当然,条件是人类还没有在战争中大灭绝。这一事态发展应归咎于政府本身致命的弱化,归咎于权力丧失了应有的权威,还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无论多么稳固、多么得到公民的信任,都经不住现代战争所释放出来的,加诸全体人口的无与伦比的暴力恐怖,这些在本文中都是无关宏旨的。事实上,甚至在核战恐怖之前,战争就已经成为政治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虽然还不是在生物意义上。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政府都不过在苟延残喘。

第三个事实似乎指出了通过引入威慑这一军备竞赛的指导原则,战争本来的性质发生了剧变。的确,威慑战略的“实际目标是避免而不是打赢它煞有介事地准备的战争。它企图靠永远不会实施的恐吓,而不是行动本身,来达到目的”。^①要知道,和平是战争的目的,所以战争是和平的准备,这种见识至少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至于谎称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保卫和平,那恐怕就更古老了,换言之,它与发现宣传机关发明的谎言一样历史悠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不管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避免战争不仅是整个政策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成为军备活动本身的指导原则。换言之,部队不再为一场政治家们希望永远都不会爆发的战争未雨绸缪,他们本身的目标已经变成发展武器来遏制战争。

而且,与这些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努力遥相呼应的是,“冷”战可能取代“热”战这一严峻问题已经浮出了国际政治的地平线。我不愿意否认,也让我们心存一丝希望:现在大国暂时恢复核试验,目的主要在于开发和发明新技术。不过在我看来,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试验跟先前的

^① 参见雷蒙·阿隆,“Political Action in the Shadow of Atomic Apocalypse”, in *The Ethics of Power*, edited by Harold D. Lasswell and Harlan Cleveland, New York, 1962。

不一样,它们也充当了政策工具。作为和平年代一种新型的对抗演习,它们本身就具有危险性。参与演习的不是常规部队对抗演习中一对假想的敌人,而是一对真正的敌人,至少是潜在的敌人。核军备竞赛仿佛已经变成了某种试探性的战争,彼此向对方炫耀手中武器的杀伤力。这场条件和时间都未定的死亡游戏突然间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而一天的胜负就可以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一切绝非不可想象。

16 这纯属幻想吗?非也。自从原子弹第一次亮相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假想战争,至少是潜在的。很多人那时认为,现在也依旧认为,只要挑选一群日本科学家,向他们演示这种新式武器,就可以迫使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这样一种演示对那些内行人来说就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具有一种绝对优势,靠时来运转,靠其他因素都改变不了。广岛事件过去十七年了,我们对杀伤手段的技术掌控正在飞速迈向这一步:战争中的一切非技术因素,比如士气、策略、指挥官的才能,甚至纯粹的机缘巧合,都被彻底消除,这样就能提前将结果精确地计算出来。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单纯试验和演示的结果对于专家们,就跟以前战场、领土征服和会谈破裂等对于双方的军事专家们一样,都是判断胜负的真凭实据了。

最后也是本文最重要的事实是,战争与革命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它们的一致性和相互依存性都在稳步增长,而两者关系的重心越来越从战争转向革命。诚然,战争与革命相互关联,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奇现象,而是和革命本身一样历史悠久。革命要么像美国革命一样,以解放战争为先导或伴随它而发生,要么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导致自卫战争或侵略战争。此外,在本世纪出现了一类截然不同的事件:对于革命将要释放的暴力而言,战火似乎只不过是一支序曲,一个准备阶段(这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对于俄国的战争与革命的理解);抑或相反,世界战争表面上就像是革命的后果一样,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

蔓延的内战,比如,就连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要根据大部分人的公共意见,以充分的正当理由来看待。二十年后,战争的目的就是革命,能为战争正名的唯一理由就是为自由而革命,这几乎变成了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无论我们目前的困境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假如我们没有被完全灭绝,与我们一道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的,很可能就是革命,有别于战争的革命。即使我们能成功地改变这个世纪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个革命的世纪。这是一场将今天的世界分裂的竞赛,并且,在这场竞赛中,许多东西都变得岌岌可危。理解革命的人将可能获胜,而那些死抱着传统意义上的权力政治不放,相信战争是一切外交政策最后手段的人,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掌握了一门毫无用处而又过时的手艺。对反革命的精通反击不了,也替代不了这种对革命的理解。反革命一词,是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中创造的,它总是与革命联系在一起,就像反动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样。德·迈斯特的名言:“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évolution.”(“反革命不是一场颠倒的革命,而是革命的对立面。”)这句话从1796年说出之时起,自始至终就是一句风趣的空话。^①

17

可是,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将原本密切相关的战争与革命加以区分,不管多么必要,我们也不可不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暴力领域之外,

^① 德·迈斯特在他的*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1796)中回应了孔多塞,后者将反革命定义为“une révolution au sens contraire(反方向的革命)”,参见*Sur le Sens du Mot Révolutionnaire*(1793) in *Oeuvres*, 1847—1849, vol. XII。

从历史上说,保守思想和反动活动,都不仅来自于它们最顽固的立场和它们的élan(冲劲),而且来自于它们在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中的存在状态。它们产生的理念或观点几乎无一不是首先用作口舌之争的,在这一意义上,它们自始至终都是派生的。另外,这也是保守主义思想家一直擅于舌战的原因,而革命者,要是他们也要发展一种令人信服的舌战风格,那就要从他们的对手那里好好学一下这门手艺。保守主义,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革命思想,它从本源上而且其实几乎从定义上,就是好战的。

战争和革命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一事实足以将它们一道从其他一切政治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什么战争容易导致革命,为什么革命会显露出引发战争的危险倾向?无可否认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暴力是两者的共性。甚至在缺乏任何革命传统的条件下,而且即便以前从未发生过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暴力,其实已经足以在战后余波中引发革命了。

当然,战争并不是完全被暴力决定的,更不用说革命了。在暴力绝对统治之处,例如极权政体的集中营,不仅法律——就像法国大革命美其名曰的那样,les lois se taisent(法律保持沉默)——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都一定要陷入沉默。正是因为这种沉默,暴力成为政治领域的边缘现象。人,就他是一个政治存在而言,被赋予言说的权力。亚里士多德对人下的两个著名定义,即人是一个政治存在和一个能言说的存在,两者相辅相成,都涉及相同的希腊城邦生活体验。此中关键在于,暴力本身是无法言说的,而不单在于言说面对暴力是孤立无助的。由于这一无言性,政治理论极少论及暴力现象,而会将有关暴力现象的讨论留给技术专家。政治思想只能听从政治现象自身的表达,它始终限于人类事务领域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这些呈现出来的东西与物理事实相反,它们需要言说和表达。也就是说,它们是某种为了彻底展现出来,从而超越仅仅是物理上看得见和听得见的东西。因此,一种战争理论或者革命理论只能为暴力正名,因为这种正名构成了它的政治界限;如果反过来,这种正名越出雷池,赞美暴力或为暴力本身正名,它就不再是政治的而是反政治的了。

暴力在战争和革命中担当了主角,由此看来,严格地说,战争和革命都发生在政治领域之外,即便它们在有记录的历史中举足轻重也是枉然。这一事实,使饱经战争和革命的十七世纪走向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的前政治状态假设。当然,这绝不是说“自然状态”可以当作一个历史事实来看待。这一假设至今没有过时,就在于它承认政治领域并不

会在人们生活在一起的地方自发地形成，承认在那里存在着这样一些事件：尽管它们可能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但并不是政治事件，甚至和政治毫无关系。无论我们是按照因果关系，潜在与显在的关系还是辩证运动的形式，甚至遵循简单的先后顺序，来设想这种自然状态，这一概念至少间接地指出了一种十九世纪的进步观所无法涵盖的现实。因为，自然状态的假设意味着存在一个开端，开端与它之后的一切泾渭分明，仿佛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19

开端问题与革命现象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端，一定与暴力具有内在联系。传说中我们的历史开端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如圣经和典故所说的：该隐杀亚伯，罗慕路斯杀雷穆斯。暴力是开端，同样，如果没有暴力的运用，没有忤逆之举，就不能缔造开端。这些在我们的圣经传统和世俗传统中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行为，无论是被人当作传说来流播，还是当作历史事实来信奉，都已经裹挟着一股力量穿越了时代的长河。人类的思想，只有化为贴切的比喻或广为流传的故事，才会具备这样的力量，而这样的情形庶几稀矣。这些故事都是直言不讳的：无论人类能拥有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都是来自于兄弟仇杀；无论人类能够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都是起源于罪恶。开端是一场罪行，“自然状态”一词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论净化的一种释义。千百年来，这一信念对人类事务状态而言，与圣约翰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对于救赎事务而言一样，都具有一种不言而喻的说服力。 20

革命的意义

1

在此,我们不谈战争问题。我提到的隐喻,以及在理论上阐释这个隐喻的自然状态理论,与革命问题的关系更为重大,因为,革命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尽管这个隐喻与自然状态理论,常常被用来为战争和战争暴力正名,理由就是人类事务固有的,并在人类历史的罪恶开端中揭示出来的原罪。无论我们企图如何去界定革命,革命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变动。现代革命,与罗马历史上的mutatio rerum(动荡),与困扰希腊城邦的内乱στάσις,都毫无共同之处,我们不能把它等同于柏拉图的μεταβολαί(一种政府形式半自然的转型);也不能等同于波利比乌斯的πολιτεῶν ἀνακύκλωσις(人类事务由于总是被推向极端而注定陷入其中的规定性循环)。^① 政治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在古代司空见惯,不过对它来说,两者都不会带来什

^① 古典主义者知道,事实上,“我们的‘革命’一词与στάσις或μεταβολή πολιτεῶν都不是完全对应的”(W.L.Newman, *The Politics of Aristotle*, Oxford, 1887—1902)。详见Heinrich Riffel, *Metabolé Politeion*, Bern, 1949。

么全新的东西。变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退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描述了一个取决于人类事务本性,因而本身一成不变的进程。

不过,对现代革命来说还存在另一个方面,从中会更有把握在现代之前找到革命的先例。谁能否认社会问题在一切革命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谁能不想起亚里士多德,在他开始翻译和解释柏拉图的 *μεταβολαι* 时,就已经发现了我们今天所谓经济动机的重要性——富人推翻政府就会建立寡头制,穷人推翻政府就会建立民主制? 在古代同样尽人皆知的是,暴君依仗平民或穷人的支持上台,他们保持权力最大的胜算就在于人民对条件平等的渴望。将一国的财富与政府相联系,认为政府形式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怀疑政治权力仅仅是经济权力的结果,并最终得出结论,利益是一切政治冲突的驱动力,所有这些当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也不是哈林顿的发明:“统治权就是财产、不动产或私有财产。”也并非勒翰的发明:“国王统治人民,利益统治国王。”假如谁想指责某一个作者采用了所谓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谁就不得不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是第一个声称利益,他称作 *συμφέρον*——对个人、团体和人民都有用处,在政治事务中居于并且理当居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的人。

然而,这些受利益驱动的颠覆和骚乱,虽然在新秩序确立之前,只会带来暴力频仍、血流成河,却都依赖于一种穷富差别,这一差别本身在政治体(*body politic*)内注定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就像生命对于人体一样。只有当人们开始怀疑,不相信贫困是人类境况固有的现象,不相信那些靠环境、势力或欺诈摆脱了贫穷桎梏的少数人,和受贫困压迫的大多数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是永恒而不可避免的时候,也即只有在现代,而不是在现代之前,社会问题才开始扮演革命性的角色。这种怀疑,确切地说是一种信念,也就是相信地球上的生命会被赐以丰饶之福而不会被咒以匮乏之苦,就其本源来说,是前革命的和美国式的,它直接来